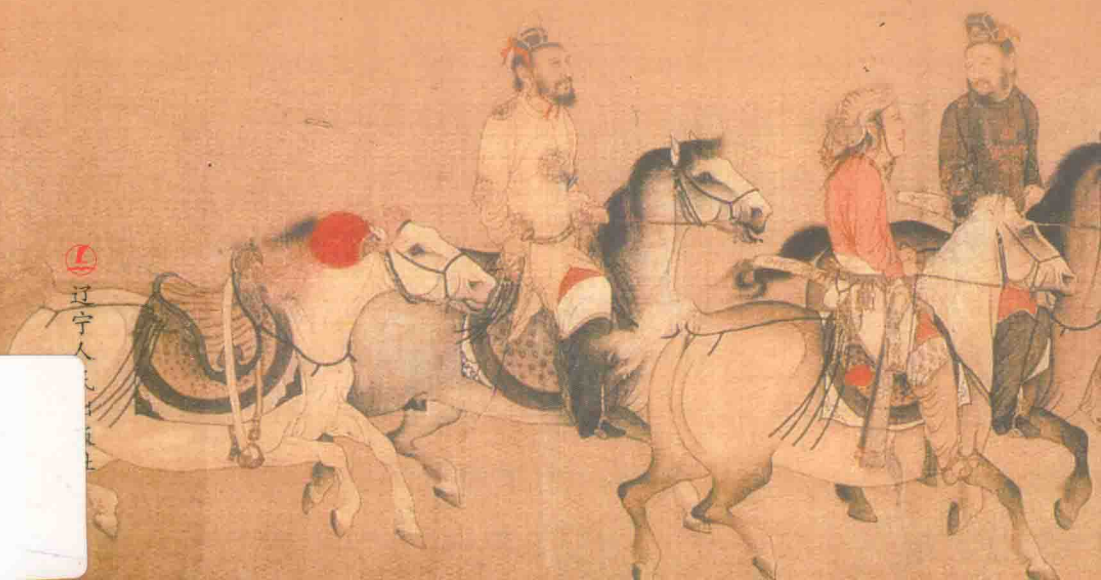


燕園史學

第十一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会 主办
李根利 主编

Proceeding
of the 11th Peking University History
Study Forum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会 主办
李根利 主编

燕園史學

第十一辑

Proceeding
of the 11th Peking University History
Study Forum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李根利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园史学. 第十一辑 / 李根利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205-08693-0

I. ①燕… II. ①李…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845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30.5

字 数: 32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 喆

特约编辑: 栗河冰

封面设计: 冯少玲

责任校对: 刘继鲁

书 号: ISBN 978-7-205-08693-0

定 价: 60.00 元



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参会人员合影(2015年3月)

《燕园史学》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以姓氏拼音为序)

包茂红	陈苏镇	陈侃理	邓小南	党宝海
董经胜	郭润涛	郭卫东	高毅	高岱
韩巍	何晋	黄春高	井上亘	蒋非非
金东吉	李新峰	罗新	陆扬	刘一皋
刘浦江	李隆国	李维	牛可	欧阳哲生
彭小瑜	潘华琼	桥本秀美	钱乘旦	荣新江
尚小明	王元周	王奇生	王铨	王立新
吴小安	王新生	王利军	王希	辛德勇
徐健	叶炜	阎步克	叶纯芳	颜海英
许平	张帆	赵冬梅	朱凤瀚	朱玉麒
臧运祜	赵世瑜	朱孝远	谷涛	赵进中
张雄	朱贞			

主 编 李根利

编委会	黄浩	孙梦婕	王健丁	翟岳	韩亚威
	滕凯炜	吴帅帅	段维维	俞莉琪	高曦
	姚舒怡	赵茜	郭欣韵	高燎	路子正
	陈凯	谢帼英	刘玉杰	龙芊良	李睿毅

稿件统筹 王健丁

序 言

北京大学史学论坛始创于2003年，最初的名字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其创意之初就是为历史学及相关专业的青年学子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切磋学问，精进创新。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成长，这个论坛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史学论坛，参与者也由当初的京津周边的高校扩展到了全国乃至日本、欧美等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影响日渐扩大，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历史学专业青年学生交流的一块重要阵地，也是现在国内延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由在校学生自管、自办的青年史学论坛。

2015年的史学论坛是第十一届，本届论坛继承往年的优良传统，积极创新，改革办会模式，在论文审核、会议流程、讲座安排等诸多环节都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论坛全程实现了盲审，更多保证了公正公平；新设了本科生专场，给优秀本科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新增了三场讲座，设计了青年教师和青年学子们自由交谈互动的史学沙龙环节等等。

经过精心筹备，2015年3月20--22日，北京大学第十一届史学论坛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5号楼成功举行，本届论坛共有52篇论文入围，作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京都大学、伦敦大学等海内外多所院校。会后组委会从入选论文中选取了25篇收入第十一辑《燕园史学》。这25篇文章的选题涵盖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专业方向的诸多方面，作者们来自不同高校，行文风格也各有特色，可以互相参考品鉴。而作为青年学子的作品，其中许多文章的观点可能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却都是一时之选，基本代表了国内外最优秀的一批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水平，请广大读者朋友给予批评和指正，也请给予青

年学子们更多的帮助与支持。

北京大学史学论坛已经摸索前行了十一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当年参会的学子已经成为当今史学界的青年才俊，这个平台确实担负起了当初设计的重任，没有辜负初衷。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和历史学系师生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兄弟院系多年以来的帮助与厚爱，更要感谢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会和学生会的同学们，是他们的辛苦与努力撑起了这个真正由学生操办的史学论坛。

办会辛苦，办完会之后出书更是苦上加苦，当年上课时曾听一位老师讲过办刊的种种辛苦，他曾戏言道：“若和谁过不去就劝他编期刊。”之前听此话就是哈哈一笑，到如今编这两期《燕园史学》时其中甘苦总算是体会到了。但辛苦归辛苦，当看到诸位同学的文章整齐地排列在那，一本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放在面前的时候，那种欢欣激动是任何事情都比不来的。

第十辑、第十一辑《燕园史学》的编辑出版，多得栗河冰女士帮助，费心劳力，甚是感动，在此特致谢忱。

本书出版之前，我们进行了多次审核和校对，但水平所限，学力不逮，书中肯定还有很多疏漏和不足之处，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多多指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会

目 录

序言	/ 1
气候变迁与晚商方国格局形式探微	魏 星 / 1
东晋前中期的皇太后位号与帝系正统性建构	张 锐 / 16
北宋前期知制造考论	张延和 / 35
赵顼与北宋神哲时代的政局	于志霖 / 53
“常州之役”与“湖州之役”	
——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中分浙西”局势的形成	郭玉刚 / 72
明朝派往东南海上诸蕃国外交使臣的演变	
——兼论交往政策的转变	董建民 / 95
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	吴才茂 / 114
治乱分合	
——“民抄董宦”事件背后的明末松江地方秩序	李根利 / 134
历算、量天法与占星术	
——论明末清初中西天文学的碰撞	尹敏志 / 149
由清代民间与宫廷祭祀仪式综观萨满信仰及其文化性格	林孟洁 / 171
清初成都地区社会重建的实践与意义（1659—1673）	郭广辉 / 198
纲册商人与 18 世纪两淮盐政	
——以江春为中心的考察	李 诚 / 218
清人张自牧（力臣）其人其书再考	张 蒙 / 240
刘师培的“六经皆史”论探	崔庆贺 / 255

身份认同与权力斗争：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失败原因再探讨	赵 茜 / 273
钱穆的历史地理学思想述论	霍仁龙 / 291
藉由“格尔塞调色板”对《金字塔文》中“天空的公牛”的考察	田 天 / 307
TuXη 的规划：波里比阿对历史的整体建构	施晓静 / 323
386 年“米兰教堂事件”史料系年 ——论安布罗修的三封书信	周之桓 / 334
“统治欲”与罗马历史：从撒路斯特到奥古斯丁的政治权威论说	田 阳 / 361
元老家族与圣徒奇迹 ——以公元 555—567 年高卢政教变动为中心	林友明 / 376
从参加宫廷仪式的形式变迁看律令国家虾夷认识的变化	梁晓奔 / 403
圣徒传记与历史书写 ——以公元 684—697 年爱尔兰北部政教互动为中心	褚敏绮 / 417
基督教国际主义的兴起与穆德的在华活动	王 浩 / 441
从“战争贩子”到“民主先驱” ——美国主流报刊中日本天皇形象的演变（1941—1947）	姚念达 / 462

气候变迁与晚商方国格局形式探微

魏 星*

摘 要：晚商以来，气候趋寒，北族南迁。适逢殷商九世纷乱，王道衰微，晋陕诸方迫于外族压力，加剧对商的离心倾向，殷商原有方国格局被打破。武丁北伐羌鬼，南讨荆楚，东平诸夷，依赖个人素质，重组并巩固了原有的地缘格局。但实际上，强人政治并不可取，武丁虽广拓四海，但似乎并未创立行之有效的方国管理运行机制。伴随强人的谢幕，殷道复衰，终于在商末，武丁重组的地缘格局也因民族重返浪潮和周人崛起而崩溃。

关键词：殷商 对外战争 气候变迁 方国格局 影响

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重要时期，亦是中原与四维之地沟通交流的关键时代。纵观历史过程，中原与四域，其间关系错综复杂，战和多变，而双方的和战又构成这一关系演变的重要主线。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盖莫如此。殷商一代，战争尤剧，且以对外征伐为最。这当与仰韶文化以降气候转寒引起的北族内迁不无关系。纵观前人研究，学界

* 魏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对于“殷商气候”与“殷商对外战争”研究颇多,^①从其内涵诸方面来说,本无剩义可言。但鲜有学者将上述问题一并考察,构建二者关系,进而从宏观整体角度认识殷商后期方国格局的演变。于此,本文拟以前人研究为基础,构建两者关系,钩沉方国格局的演变轨迹,以期求教于方家。当然,还需说明,此文虽旨在探研气候变迁对殷商后期方国格局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本文倾尽全力探讨的是后者的变化。换言之,笔者仅以前者为条件,至于后者如何变化才是研究的关键。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新思想与新思潮伴随西方自然科学纷至沓来。适逢安阳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已取得丰硕成果,历史气候,尤其是殷商时期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一时成为学界考察的热点。^②经学界百年来的研究,学术由粗而精,日益规范严谨,在这一问题上已然成果累巨,且不乏真知灼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便是典型。文中指出:“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线大约向南后退纬度从 1° – 3° 。如果检查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降低 3° – 5°C ,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 2°C 。”同时“在近五千年中最初的两千年,即

① 有关“历史气候”的研究,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5–39页;周国灿:《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7–136页。关于殷商对外战争的研究极多,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针对特定方国的研究,如王国维:《鬼方昆夷獫狁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606页;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古族甄微》,四川:巴蜀书社,1993年,第101页;贝塚茂树:《周明けの东方について殷末経略》,《贝塚茂树集作品集》第三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年;伊藤道治:《邑の构造とろの支配》,《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出土資料を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5年等。另一类侧重殷商对外战争研究,如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东京:汲古书院,1977年;白川静:《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构造》,东京:平凡社,1972年;Michael Loew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9。

② 所谓“历史气候”,《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将其解释为:“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尚无仪器观测的历史时期的气候。”参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C 左右”。^① 换言之，在距今四五千年左右，殷商一代气候总体向冷的方向发展，其间会有上下波动，然限于史料已无从考证。

竺氏之说虽经后世学者增补完善，但其主体部分在史界已无太大异议。^② 不可否认：无论农耕文明抑或游牧文明，其播种畜牧在一定程度上均会依赖于气候，不过相对于耕作种植而言，畜牧渔猎或许对适宜气候的依赖更为明显。史籍多载游牧诸民，其俗常“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③ 又“终岁不迁，牛马半死”（《韩非子·十过》）。适逢晚商气候趋寒，水草渐稀，牧民生存环境恶化，寻找新牧场已然成为当务之急。中原之地气候温暖，农牧皆宜，北族南下或正基于此。不可否认，势不可挡的民族南迁虽出于被动，但势必与久居中原的华夏诸国相接触。处于向文明攀登阶段的游牧诸族在南进中原探寻草场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着中原地区原有的方国格局的面貌。

当然，为合理钩沉晚商方国格局之演变轨迹，首需明确何为“方国格局”。^④ 对此，笔者以为所谓方国格局当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内，居于地域内诸方国的分布状况及诸方国与居于主体部族的互应关系。综括言之，方国格局可理解为商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所形成的一种持续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地缘性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 15-39 页。

② 葛全胜先生在《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一文中指出：“此后的研究表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参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发表 30 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 年第 4 期，第 311-317 页。又文焕然先生根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将竺氏之说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气候温和期”更具体地修正为距今约 8000-2500 年前为温暖时代。参文焕然、徐俊传：《距今约 8000-2500 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地理集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年。

③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483 页。

④ 史界与考古界对“方国”一词理解略有差异。其中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者认为：“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 4000 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经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又认为武王伐纣“是方国与方国的战争”。参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11-123 页。日本学者更倾向于用“都市国家”“邑制国家”等术语规范、界定方国一词。笔者以为，无论是苏先生对“方国”一词的界定，或是日人对于商周国家性质的质疑，从理论和史料依据来看似都不无道理，但为方便行文，笔者暂从国内学界对“方国”一词的一般用法。

不仅体现在四夷诸方以所居地域的地力、物产及经济水平为划分依据,任土作贡,并承担相应的贡赋义务。《禹贡》一篇粗成于武丁以前,后经周秦诸儒增补而成。^①此篇虽托禹而作,实述诸方贡道。殷商诸方虽不尽依《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任土作贡”,^②但亦可对殷商“中心—外围型”的贡赋模式窥见一二。其二,诸方在地域上虽各自相对独立,但从史传行文来看似存在以殷商为轴心的方国行政体系。殷商承夏制度,以诸方距王畿远近为据,推行内外服之制,通过“作册”、“设奠”等方式加强对诸方的管理。对于五服说,以《尚书·禹贡》所言最为流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司马作《史记》因其说而略加七字。^③此后《酒诰》一篇详尽分五服为内、外两服。战国时荀子著《正论》大抵沿用此说。^④但秦汉诸儒间作《周礼》,其语多抵牾,《夏官·职方氏》记作“九服”,《夏官·大司马》变“九服说”为“九畿说”,至《秋官·大行人》又更为“六服说”。此外,同书又载殷商专以设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已图邦国间“大小相维”。当然,如《周礼》所述之方国格局固然无法实现,但据近来学者考证,以地缘为核心,通过“作册”“设奠”等手段对方国进行管理的模式或有渊源。

①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邵氏以为“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期的托古假设,而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自然形成的人文区系”。进而邵氏以多座考古遗迹相证,指出《禹贡》一篇其蓝本出于公元前1000年(当商代武丁时期)以前,其后迭经加工修订而成今本。

② 《尚书校释译论·夏书·禹贡》序,顾颉刚、刘起钎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32页。

③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94页。

④ 《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荀子简释》,梁启雄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240页。

对于“作册”的执掌，据王国维考证：“作册，官名”“皆掌册命臣工之事”。^① 近来学界依卜辞研究发现，“作册地位显然高出史官，其职责应是掌册命并负有武职。”其“最大的职责是助王征伐和安抚敌国诸侯”。^② “设奠”似乎是“作册”的一种补充手段，其补充更多地体现在对诸方的地缘安置上。裘锡圭先生认为“奠是商人处置附属者的一种方法，商统治者往往将战败国族或其他诸臣服国族的一部或全部，奠置在控制区域内”。^③

通过作册远征诸方，并将被征服国奠置于控制区内的手段，殷商确实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固有地缘格局的基本稳定。但这一机制其实本身并不完善，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地缘格局本身也十分脆弱。换句话说，如若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使殷商国力长足发展，没有一个适宜的客观环境和外部条件允许这一机制正常运转，殷商本身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实现远近宾服，一旦上述任何一个条件发生变化，这一地缘格局都不太可能继续保持稳定。但晚商以来，气候趋寒，北族南下之潮势不可挡，适逢殷商九世纷乱，国力衰退，原本脆弱的地缘格局被打破似已成定局。从宏观看，殷商后期方国格局的演变不仅呈现出固有的复杂性，更多的，还随诸条件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由此，笔者拟依学界主流研究，将晚商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以方便下文的钩沉。^④

二

从宏观考察殷商一朝政治之起伏轨迹，自盘庚迁殷以降至武丁继位可谓是波谷与波峰间的过渡期。其间上承“九世纷乱”之余绪，下启“武丁中兴”之

① 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第38-39页。

② 李雪山：《商代封国方国及其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系，2001年，第14页。

③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祿”》，《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第8-18页。

④ 殷商后期方国格局演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盘庚迁殷至帝武丁以前（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3世纪中期）为固有方国格局的打破瓦解时期，第二阶段为武丁继位后的五十九年（约公元前13世纪中后期-前12世纪初）为方国格局的重塑，巩固时期，第三阶段自武丁以降直到商王朝灭亡将近一百五十年（约公元前12世纪初期至前11世纪中期）。

按：本文中涉及具体时间概念皆参考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纪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先河，是殷商国力的恢复阶段。但史籍只留下只言片字的记载，且多集于盘庚一朝的徙都事件，几乎未涉及对外战争。对此，笔者仅以史书诸言为本据，兼以甲骨卜辞所见武丁的战争行为作旁证，钩沉这一阶段方国格局的演变轨迹。《史记·殷本纪》言殷商自中宗太戊以后，殷道复衰：

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①

据卜辞见，诸侯莫朝多为晋陕方国，武丁以其不来朝而伐之。究其原因，史籍虽无明言，但据笔者推测，无外乎有二：一、部分方国对商的离心力较强，承担朝贡义务更多的只是迫于殷商强大的军政实力，适逢殷道复衰，商王朝对诸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加剧了诸方对商的离心力；二、部分方国可能受迫于南下北族的军事压力而屈降北方。但无论怎样，原有地缘格局被打破当属定论。为合理说明，现仅以王畿北疆的基（缶）方^②为例，卜辞载：

1-1 己未卜，殷，贞缶来见王。一月。一，二。

1-2 己未卜，殷，贞缶不其来见王。一，二。

1-3 己未卜，殷，贞缶其鬻我旅。一月。一，二。（《合集》1027 正）

2 □□卜，殷，贞……缶其伐雀。二告。（《合集》6989）

又：3 [己] 卯卜，殷，贞基其戎。（《合集》6581）

4 丁卯卜，殷，贞王鬻缶于𠂔。三月。（《合集》6863）^③

① 《史记·殷本纪》，第130-131页。

② 据陈梦家先生的考证，基方在今山西永济。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94页。

③ 文中所引《甲骨文合集》皆简称《合集》，且文中所有释文皆从胡厚宣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释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基”或写作“缶”，原臣服于商，卜辞 1-1 言“来见王”即是如此。武丁以其不来朝，且已“伐雀”，由此发动对基方的战争。“伐，伤也。从戈，才声”，^①又“雀”是武丁时期的一个将领。所谓“伐雀”即可解为基方已然威胁到雀的安全。细读卜辞不难发现，诸如基方之类，原臣服于商后又与商交战的方国还有很多，从地域看，诸叛方多居于王畿以北的陕晋高原。客观地说，殷商虽历经“九世之乱”，国力大衰，但诸方国叛离似与北族的南迁即外部压力不无关系。

其实，九世之乱的影响远不仅“诸侯莫朝”这么简单。殷商出于管理外服而设置的官吏也趁乱独立为一方侯伯：

丙寅卜，争，贞呼龙*侯专崇不又。一，二。（《合集 6834》正）

……[伐]归伯……[受]又。（《合集 33070》）

戊口卜，令雀伐中侯（《合集 33072》）

纣……乙亥火……曰：伯尹……（《合集 5949》）

己酉卜，般，[贞]令般取龙[白]（伯）。二。（《合集 6590》）

这些方伯曾不同程度地臣服于商，他们与王畿的关系也绝非一成不变。有商一朝，诸方伯或“四方咸归”或“诸侯有叛”，总之他们都扮演着多重角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角色更加凸显而已。

面对北族南迁和侯伯的离散，抑或是出于稳固边防的目的，商王盘庚将都城越河北迁。虽然学界对盘庚迁都之原因众说纷纭，^②但笔者更倾向于将迁都原因定位在军事和防御的趋向上，我们不妨做简要试探。对于盘庚迁殷，史载：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尚书·盘庚》书《序》

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

① 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第十二下《戈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691页。

② 按：对于盘庚迁殷的原因诸说刘起钊先生已有所总结，参氏著：《尚书教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75-991页。

年，更不徙都。^①（按：此七百当为二百之误。范氏之书已指出。）

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②《史记·封禅书》。

对“殷”地所在，不乏前人探索：

阳渠水又东迳亳殷南，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此始也。^③《水经注·谷水注》。

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出纪年》云：“……是旧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也。”^④

《水经注·洹水注》又载北蒙地望曰：“洹水又东迳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洹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园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洹水又东迳大蒙城北，自古不闻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谓景薄为北亳矣。”^⑤

盘庚迁殷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更不徙都”。^⑥“殷”之所在虽众说纷纭，但其地在河北以无争论。南下诸族所引发集聚上升的国防压力也已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殷商的稳定，殷商原属诸方似也迫于强大的军事压力加剧对商的离心力。部分地方官长或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自立为侯伯。为了扭转局面，新继王

①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祥雍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②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张守节正义第1649页。

③ 郦道元撰：《水经注校证》卷十六《穀水注》，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7页。

④ 李泰等撰：《括地志辑校》卷二《相州》，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2页。

⑤ 《水经注》卷23《洹水注》，第556-557页。

⑥ 从现今的考古发现看，至少截至目前还没有发掘出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都城遗址，虽然现在诸学者对这一问题有着其他的意见，但笔者还是以当今考古学为依据坚持“二百年更未徙都”的说法。